

郭良平 专栏

中国在哪里？

设想现在中国来一次大规模民调：“你认为我们国家目前的方向正确吗？”这种民调在民主国家乃家常便饭，它使政府在大选之间能够了解人民对政府方针政策的评判，以便做出调整。缺乏这种机制的国家，领导人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自行其是而不觉违和。目前中国内忧外患，中共三中全会的推迟表明执政党内意见不一，举棋不定。这正是民调发挥作用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最根本的三个哲学问题是：“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对中国而言，更紧迫的是搞清楚：“中国在哪？”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展风生水起，国运畅通，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140余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基础设施、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的收入随着经济增长水涨船高，生活蒸蒸日上；人们乐观向上，对未来信心十足。然而近些年来形势急转直下：经济低迷，投资、消费和出口三个引擎同时熄火；投资萎靡不振，供应链纷纷外迁；房地产业暴雷，地方债高企，商业区一片萧条；人们对未来相当悲观，扎紧钱袋以备不测。中国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发达国家对它的开放，使中国能够在技术、科研教育、市场、实际知识（know-how）、人才等方面得到大量好处。现在西方将中国定性为异类、威胁，正与之分道扬镳，有可能走向长期对立。

异质文明大国崛起的特殊性

人们常常将这个转折，归因于中国迅猛崛起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然而修昔底德陷阱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困境。在数千年的世界文明史中，大国崛起靠的是蛮力，与文明程度无关。落后的渔猎和游牧民族往往可以轻易征服发达的文明中心，如蛮族冲垮罗马帝国、蒙古铁蹄横扫欧亚大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等。但当今世界已形成国际社会的文明水平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被认同和接受，成吉思汗靠屠城来征服世界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小国弱国不仅生存下来了，而且数目不断增加。这些说明游戏规则变了，霸权国还必须代表文明的最高水平才有合法性。

中国的崛起对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秩序的震荡，是不言而喻的。现秩序内的主流国家是否接受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变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各方面的水平。德国、苏联和日本都未被接受，尽管它们都很强大，还是被主流国家联手打垮了。美国取代英国成为霸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在同一文明中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异质文明大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不可能在西方文明之内实现，因为它即使成为标兵，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当个跟班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更多取决于超越当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必须为将人类带入更高的文明境界做出贡献，方能得到认可和悦纳，成为头羊。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发达国家的民调中声望屡创新低，被视为生存威胁。不被主流国家的认可和接受，给中国的崛起带来大量障碍，而且它们联手就有力量让中国的崛起脱轨，后果不可谓不严重。这里，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拥护，对中国的助益不大，因为中国要超越的是发达国家的水平。（更全面的分析请参阅拙作《高水平才能和平崛起》，刊于2021年10月18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测试中国目前的水平

毫无疑问，对中国妖魔化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中国的偏见甚至故意抹黑。但对中国目前的文明水平，可以做一个基本测试：人们普遍能够讲真话吗？如果还达不到这个最起码的标准，就难怪不被认可和接受。

另一个测试是，检讨一下这些年国外媒体大肆炒作的现象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虚构的：封锁言论和信息，千人一调、万人一腔，人们不敢讲话或大讲套话、谎话；没有法律根据的屏蔽和封号；法外拘禁和人员凭空消失；过度监控，鼓励告密，泛国家安全；钱权交易和垄断、裙带关系；打压信仰自由，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禁止“妄议中央”，强求绝对忠诚和服从；以党性取代理性和共识；权力缺乏监督和制衡，群众缺少参政议政空间和平台。这些可能被夸大了，或者同中国取得的成就和制度的其他优点相比，都不算什么，但如果国外将它们归入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难怪人家不买账而且感到威胁了。

是否出现大批移民和资金外逃，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投资和消费是否旺盛，街头外国人的多少等，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民调，测试人们对国家的走向正确与否的看法。

只有吸收现代文明的精髓之后方能超越，只有站在西方文明的顶峰才能更上一层楼。看中国舆论界甚至学术界，晚清以来那种为了奋发图强而虚心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几乎荡然不存，代之以缺乏分析的“文化自信”。政改不能总以巩固执政党地位为中心，而不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筹谋。

如何走到这里的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惊艳全世界，其中必然有许多东西可供他国学习借鉴。中共如何总结成功，也会影响到它下一步怎么走和国家的方向。西方国家决定全力以赴打压遏制中国，是2017年之后的事，而且它们以惊人的速度形成共识，把中国看作异类和威胁。这个节点恰恰是中共总结改革开放、绘制未来蓝图的时间。

也就是说，它们不喜欢这个总结和制定的方向。所以中西关系的恶化，原因不仅仅是修昔底德陷阱，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一些根本性的原则和价值观上触了西方的逆鳞。

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既定方针政策的实际效果如何。这些年的左转，将上述斯大林模式的恶纷纷带回来了。指导左转的是盲目的“初心”，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它在国内外的后果。比如“共同富裕”是初心，但重新提出来时，有目标却没可行方案，在国内让许多人以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要回来了，在国外让人以为苏联要还魂了。两者的社会基础都存在，使中国很容易滑入旧轨道。

从根本上讲，祸源可以追溯到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是盲目的理论自信下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高层对中国成功的经验有个奇葩总结：“马克思主义行！”这种创新不足的理论自信，使它背上了旧意识形态的包袱。以此来冲刺当代文明最高水平，显然有点先天不足。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全错了，而是说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代，它远远不够，须要创新和发展。用它来解释改革开放的成功很牵强。创新不足的理论自信，必然导致制度上和道路上向旧正统回归，让人有倒行逆施的感觉。比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阶级属性，必然不会尊重人权；文革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有理论基础而无法律根据和道德良知的犯罪。

第二个误区是将党建放在民族和人民之上。以党为本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现实，而不是像通常那样，政党从民族和人民中获得生命力与合法性。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模式的局限性，很难在世界上广为接受甚至理解。一个国家发展最深刻的动力来自民间，而不是执政党，本末倒置会限制中国的长远发展潜力。中国需要的是社会的社会主义，而不是党国的国家主义。

回归世界主流

中国回归世界主流并不难。第一是“道法自然”。中国的成就世界瞩目；更加客观、实事求是的总结，而不是为了维护政治利益硬往马克思主义上扯，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善莫大焉。只有将这个关系理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并在此基础上提高各方面的水平，攀登人类文明高峰。

第二要站在巨人肩膀上。只有吸收现代文明的精髓之后方能超越，只有站在西方文明的顶峰才能更上一层楼。看中国舆论界甚至学术界，晚清以来那种为了奋发图强而虚心向西方学习的精神几乎荡然不存，代之以缺乏分析的“文化自信”——很少有人讨论中华文明中的哪些要素，如何同西方文明的哪些要素结合，方能克服各自的哪些缺点，让人类文明达到新境界。相反，人们很容易就回归天朝大国的优越感——正是这个心态造成中国的落后和百年国耻。

第三是政治模式转型。首先是党建模式：政改不能总以巩固执政党地位为中心，而不为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筹谋。于是推行党组织的全覆盖，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而且党的一元化领导时常个人化。这里的误区是在党内而不是民众中寻找和开发动力。人民，而不是执政党，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维护党的根本方法是将它植根于民众之中，这是毛泽东的伟大发明。现实情况是：细密的党组织和它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压缩了人民的成长、成熟和创新空间，窒息民间活力。自主空间是任何人成长成熟的必要条件；中国庞大的权力金字塔不仅挤压老百姓的空间，也剥夺了党员干部的自主性。他们天天在多少个意识、多少个确立、多少个维护等的紧箍咒下度日，而念咒的却总抱怨他们的躺平、侧卧和搞形式主义。

最后是要应对一场文化大革命。短缺经济一去不复返，市场经济是消费经济，排斥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和禁欲的文化。红色一脉的文化基因里缺乏幽默和享乐，这是由其苦难的经历决定的，但欢乐享受是年轻一代生活的追求和主要内容。存在决定意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调整文化来应对新的现实，就会造成执政党与年轻一代的脱节甚至对立。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